

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

李辰冬 著

中华书局

李辰冬 古典小说研究论集

李辰冬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李辰冬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ISBN 7 - 101 - 05154 - 5

I . 李… II . 李… III . 古典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I207.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071 号

书 名 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
著 者 李辰冬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1/4 插页 4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5154 - 5 / I · 709
定 价 29.00 元



李辰冬，河南省济源县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八月二日。父名李葆惠，母李魏氏，父曾任小学校长及县长。辰冬六岁入学，十二岁只身离家就读开封第二中学，十八岁赴北平就读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所攻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廿七岁获文学博士后返国。先执教母校燕京大学，一九三五年任天津女师学院国文系教授。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辗转至重庆，执教中央政治学校。当时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先生深爱其才，聘为主任秘书，并主编《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两月刊。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奉派为中央文运会平津特派员，主编《新思潮》月刊，两年内大力推展文化工作。一九四七年任北平参议会秘书长，唯因性格耿介不仕途，更以无暇读书为苦，一九四八年毅然远赴兰州执教西北师范学院，《陶渊明评论》即在该时写作完稿。一九

四九年夏经广州去台湾。抵台后师范学院刘真院长得知,立即聘任为国文系教授。一九五四年创办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一九六三年应新加坡义安学院之聘,辞去函校校长职。在新六年完成《诗经研究》、《诗经通释》及《诗经研究方法论》等著作。返国后再执教师范大学及研究所,一九七八年退休仍行兼课。自认个人时间较多,乃专心治学著述。一生好学,著作等身。

一九四五年在天津认识了王志敬女士。王志敬,天津人,毕业于河北省立天津女师学院家政系。与李先生结婚后,赴台执教实践家政专科学校、师大家政系及新加坡义安学院家政系。育有一女一子。女李木兰,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赴美入西东大学双语研究所,获教育硕士学位。子李澄志,赴美完成电脑硕士学位。二人均在美任职。

四十余年来,李辰冬一直夜半起床读书写作,日以继夜,年复一年,以致血压偏高。后因糖尿病导致心脏疾病,更引起脚趾坏疽症,行动不便,五年内住进医院七次,但未因病痛而气馁灰心,仍以读书为乐。

子女挂念他的健康,再三恳请赴美团聚。一九八三年二月赴美医治,在父慈子孝婿贤、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时,仍急于完成《中国文学意识发展史》,日夜相继,不眠不休,终因用脑过度,血压再次升高引发轻微中风,左手活动失灵,经住院检查治疗返家休养,逐渐恢复正常。又因白内障视力减退,双眼流泪,阅读写作颇感困难,再经治疗后感觉良好。正因健康好转不需再坐轮椅,可以自己走动散步时,不意竟于八月二十八日晚十时突因心脑衰竭,数分钟内不治逝去。九月五日在休斯顿明湖中国教会奉行安息礼教,行火葬礼,骨灰存在明湖公墓。

李王志敬

前　言

石昌渝

李辰冬(1907—1983)是中国现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专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著作,1949年以后,除《红楼梦研究》被摘编在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中以外,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李辰冬是河南省济源人,1924年进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193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西北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83年病逝于美国。他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研究》、《三国水浒与西游》、《陶渊明评论》、《文学新论》、《杜甫作品系年》、《尹吉甫生平事迹考》、《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等等,其中尤其是他的小说研究著作历年多次再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后来在中国台湾及海外都有很大影响。

在小说研究领域,如果说胡适、鲁迅等是“五四”现代学术的第一代的话,那么李辰冬则属于第二代。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提倡白话和白话文学,他们推崇白话小说,并在他们的研究中引进西方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取代那些旧式的随意鉴赏、直觉评论以及猜谜式的索隐,使小说研究获得了现代学术的品格。用胡适的话来说,“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

平坐”^①。

从 1920 年到 1933 年,胡适为十二部小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研究文章。胡适的小说研究主要是作家作品研究,采用的是历史的方法。胡适认为古代白话小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另一种是作家独自创造的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对于第一种小说,他是“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②。对于第二种小说,他是“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③,并尽量搜集作品本身版本的演变及其他方面有关的资料。胡适对两种小说的两种研究方法虽然有具体的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的方法,或者说考据的方法。胡适在他的小说研究中几乎没有关注作品的文学内涵,他谈到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时也说,“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④。俞平伯受胡适的影响,但他没有局限于胡适的观点和方法,他从作者和背景的研究转移到小说文本的研究,用文学的眼光并使用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尽管他的评论带有明显的文人的趣味性,但他毕竟强调了要从作者的态度深入到文本,以探讨文学风格为指归,从而,他的《红楼梦辨》(1923 年)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起成为了新红学的学术典范。

鲁迅的历史性贡献在小说史研究方面,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于 1923、1924 年,这部著作成功地运用了文学类型的理论,以

① 《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 年 8 月第 2 版,第 258 页。

②③ 《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 年 8 月第 2 版,第 212 页、264 页。

④ 胡适《与高阳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8 月版,第 289 页。

时间为经,以小说类型为纬,清理出中国小说发展的线索,确立了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经典的小说史叙述模式。

然而现代学术的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传承,不断地添砖加瓦。李辰冬上承“五四”第一代,他的贡献是在他的研究中建构了一种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他运用这种方法把握了古典小说的文学特性,比较全面地评论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并且比较科学地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两篇文章中曾慨叹当时的文学研究没有走上正轨,呼唤新的方法的出现,他说:“至于那新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方法呢?这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以产生的社会的因素。”^①李辰冬的小说研究恰好与郑振铎的意见相呼应。

李辰冬的研究方法,简而言之为两句话:“从作家的本身来认识作品,从作家的时代来认识作品。”他解释说:

所谓作者的本身,就是将一位作者所有的作品摆在一起,毫无成见地来看每篇作品所表现的意识是什么?用什么文体来写作?用什么材料来表现?用那些词汇来描写?诸如此类的比较,就发现了作者的本人。这样还不够,仍得进一步来追问他的血统,他的天资,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环境,他的思想,他的友朋,他的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设施,因为这些因素是促使他写作的原动力,也是限制他只能用这种文体、这样材料、这些词汇的因素。一个人的内心表现在他的外表,只能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1—302页。

从这些零星琐碎的外表来认识一位作家。我们处理这些零星琐碎的外表，一点不加爱憎，一点不加取舍，只用比较的方法将它们作一种统计，那末，作者的本来面目也就自然呈现了。其次，再将各个作家作一比较，发现了他们的异同而分出时代先后，再追究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思想主流与外来影响，这样，就又认识了每一个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很显然，这样的文学研究法，是由作者的本身出发，看他说些什么？为什么要创作？然后再追究到所以造成他这样作家的外在的许多因素。^①

李辰冬的两部小说研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三国水浒与西游》就是这种研究方法实践的产物。

《红楼梦研究》是李辰冬的博士论文，原本为法文，1934年杀青并由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出版。回国后才改写成中文，1942年在抗战中的重庆出版。李辰冬为什么选择《红楼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这固然与他早年在家庭中就与《红楼梦》结缘有关。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弟妹们都是《红楼梦》迷，全家常常互相讲述和辩论，“充满了《红楼梦》的气氛”^②；但主要还是出于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一种精神寄托。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那时的情绪非常苦闷，因为我国在不抵抗的主义下，丧地千里。每次与西洋人接触，没有不以这个问题来询问的。我们是学生，既不能回国参加抗日的行列，也无法子解释为什么我国在不抵抗的主义之下把东北失掉。即令解释，西洋人也无法了解，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不抵抗”的观

① 李辰冬《文学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8月版，第8—9页。

②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自序》（1941年）。

念。就由这种耻辱与苦闷，渐渐地也不愿意与西洋人接触，甚而也不愿意在大街上走路，怕人家背后指说：“这是不抵抗主义者！”由于耻辱，由于苦闷，由于自己国家地位的低落，渐渐回想到我国光荣的古代文化。于是想把我国的固有文化，表彰一番，以作心灵的安慰。那时，我想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洋人，意思是说：我们也有与你们同样伟大的作品。^①

身在异域，而心系濒临危亡的祖国，在耻辱与苦闷之中找到《红楼梦》，藉以作为民族自立的一种精神支柱，这是一段很真实的、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它也表达了李辰冬对《红楼梦》的根本评价。^②

按照李辰冬“从作家的本身来认识作品，从作家的时代来认识作品”的思路，《红楼梦研究》的专著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言”，评述“五四”以来《红楼梦》研究的进展与不足。第二章“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分析了曹雪芹的个人意识及其成因。第三章“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论述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雨村、薛蟠等六个人物，这是“五四”以来小说研究的第一篇现代意义的人物形象专论。第四章“红楼梦的世界”通过对小说四百多个人物所组合的社会的分析，揭示《红楼梦》的文化精神，本章共分家庭、教育、政治与法律、婚姻、社会、宗教、经济七节。第五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红楼梦人物的描写，二、红楼梦的结构，三、红楼梦的风格，四、红楼梦的情感表现，五、曹雪芹的地位。《红楼梦研究》中文大约七八万字，算不上鸿篇巨制，但它却是建立在现代文学理论基础上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作品论。

①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合版·自序》(1958年)。

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有同样的评价，他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就红学而言,撇开旧红学的杂论、评点和索隐不谈,最早引入西方理论来解读《红楼梦》的当属王国维。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阐释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他把《红楼梦》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号入座,而没有从小说的形象体系入手,进行文学的论析,因而称不上是全面而系统的文学作品论。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和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前者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诠释《红楼梦》,后者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说《红楼梦》。王国维、吴宓、佩之都是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文学作品,宣布告别了传统的文学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声,他们在现代学术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但他们都不是从作者和作品本身出发去探寻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都有在中国作品上贴西方概念标签之嫌。胡适《红楼梦考证》是用历史的考证的方法,求证了作者是曹雪芹,从而廓清了笼罩在《红楼梦》之上的各种索隐派制造的迷雾,胡适并没有进入作品本身的研究。俞平伯《红楼梦辨》的焦点在八十回前后文本的辨析上,也不是对《红楼梦》的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李辰冬曾经说过:

文学批评之难,难在无偏见。一种评判方法之完善,不在它能推翻别的方法,而在它能包涵一切的方法而不相冲突。每种方法都有它的使用对象,那就有它一部分用处。它的错误不在其本身,而在它要以偏概全。说它的方法不完美,则可;说它不是方法则非。从四周八面看桌子,任何角度所看的均为桌子之一面,如以一方所见为桌子的全面,则非;若说它不是桌子,也非。四周八面的桌面总合才是桌子的全体。我们用考证的方法来认识作品,你不能说他所认识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品的一面。同样,我们用美学的纯欣赏态度来领会作品,你也不能说它领会的不是作品,然也不是作品的整体。至于用裁判的、比较的、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种种方法,所认识的无一不是作品的一面。要得把这些方法统

统运用起来，才能认识作品的全豹。^①

《红楼梦研究》的论证框架和结构，体现了李辰冬文学批评对全面系统性的追求。他在论述中把作者的个人意识与作者的时代结合起来，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作品的内涵，综合艺术表现的各个侧面来论述作品的艺术性，然后总地评论作品的文学价值。尽管他的批评实践与他的理论预设并不完全重合，尽管他的观点和方法仍有缺欠，尽管他的判断仍有某些主观片面处，但是应当承认，他所建构的这种作品研究框架，是文学研究现代化的一大进展，而且至今仍然是被广泛采用的小说作品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型。

“五四”新红学的两大主题，一是作者问题，二是后四十回问题，对这两大主题，《红楼梦研究》均有深化和发展。李辰冬对胡适的考证评价甚高：“《红楼梦》为曹雪芹所写，且一部分材料取自他自己的家庭，无疑地成了定论；尤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的发现，更使这种定论成了铁案。”^②他认为胡适考证出作者是曹雪芹，目的便达到了；但胡适在这个真理上再往前推论一步，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就未免和索隐派说贾宝玉是清世祖、是纳兰性德一样有点可笑了。因为这个推论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

以创作的过程论，创作绝不会是实在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以他的家庭作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就有语病。作家的写小说正同惜春的画大观园……老实地抄写模效，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的性格关系。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先生也不免有太拘泥史事之嫌。^③

^① 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初版自序》(1944年)。

^{②③}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一章“导言”。

在李辰冬看来,运用考证的方法在它的限度内固然可以得出真理,超出了它的限度就会产生错误。

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李辰冬认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从回目上、故事上、章法上比较八十回前后的异同,指出后四十回断非曹雪芹所作,结论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俞平伯的比较还是限于表面,只做版本、回目、故事及章法等等表面工作是不够的,而应该深入到文学的内在层面,在作者的人生态度、环境描写和文学风格等方面下手。他说:

任何伟大作家的思想,都是一贯的,前后绝不会矛盾。但把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比较一下,就知不论是思想上或处世的态度上,都有不同。曹雪芹的思想是达观的、厌世的,而后部作者的思想是积极的、入世的。前者的态度是自然主义的,而后者的态度是功用主义的。

.....

一个人生到某样的环境,使他见到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又有意无意地表现到他的言语与文字里。人们可以模拟一切,但这环境的气概无法模拟的;除非自己也是这种环境的人。曹雪芹做过繁华的梦,他家几代做大官,藏书又多,加以他的祖父曹寅能诗,养成一种喜欢美术的环境,饮食起居,日用应酬,无不讲究,所以他的见闻异常广博。.....这样,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处处留下富丽堂皇的痕迹,连莲叶汤的模子,也是银做的。.....可是一读到后四十回,不但贵重陈列、希世珍宝和海外的奇物没有了,即宝玉等的衣服饮食,也不像前部那样细心地来描写。只以《红楼梦》里所表现的气象,就知道前后不是一个人写的。

至于风格,我们知道曹雪芹对北京话异常注意,处处照着自然的语言,又把自然的语言美化了。他的人物从上到下,没

有不是能言善语。……自从八十回后，我们处处觉得言辞的生硬，语句的造作，完全失去了自然性。前八十回能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使我们喜，使我们怒，使我们悲，使我们爱，使我们憎。总之，他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事实少而意象与情感多，即令事实，也为附着意象与情感而设，并非无缘无故，充塞篇幅。自八十回以后，所写的全是故事，读的时候，味如嚼蜡，枯燥生涩，好像从八十回里取些事迹，把这些事迹结束罢了，引起不起我们一点意象与情感。^①

显然，李辰冬是循着文学内在的轨迹，以作者因为特殊的血统、环境、教育、生活等等所形成的个人意识为指标，来辨析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对人生的认识和艺术气质风格的差异，从而深化、丰富和增强了俞平伯的断案。他同时还补充说，后四十回虽不及前八十回，但比较起其他十数种的续作，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李辰冬宣称他撰著《红楼梦研究》的用意“只在解释它（《红楼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②。为了充分有理有据地论证这个问题，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以欧洲第一流批评家研究他们第一流作品的结果，来与《红楼梦》作个比较，就是说把他们认为第一流作品必具的条件，看看它是否据有此种特质”^③。

关于《红楼梦》的人物描写，李辰冬并不着意分析某个人物有何种性格，而是强调曹雪芹在描写人物时善于移情，“他只是平心静气，以客观的态度，给每个人物一种性格，仅此而已。平心静气，客观态度，惟有善于移情的人，才能如此，且因他善于移情，最易捉住人物的灵魂，所以《红楼梦》里往往几段或几句话，就创造一位活生生的人物”^④。李辰冬的“移情”说来自泰纳，泰纳认为凡伟大的

^①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一章“导言”。

^{②③}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初版自序》（1941年）。

^④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五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艺术家都善于移情，人类、禽兽、植物、风景，不论那物体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他们都能够赋予其灵魂和情感。因此，李辰冬说，“鉴别一位艺术家的高下，只有以移情作用的强弱为标准。换言之，就是他所表现的愈是灵魂多而事实少，则其移情作用也最强，故而艺术家的地位也愈高”^①。他把曹雪芹与莎士比亚以及巴尔扎克、福罗贝尔、托尔斯泰进行比较，尽管他们都善于移情，巴尔扎克、福罗贝尔、托尔斯泰是“先要著作而后去经验人生，观察人生，好像藉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曹雪芹同莎士比亚一样，他们不需要多年的练习，也不想作品要证明什么，他们之所以写，是因为不能不写，他们只是“自然地、从容地、一幕一幕的意象，一幅一幅的绘画，不断地去抄写实在”^②。

在作品的结构上，李辰冬认为曹雪芹也与莎士比亚有相同的境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结构也是宏伟和系统的，但它们段落清楚、章节分明，而《红楼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无所谓起讫，“其结构的周密，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前起后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不禁起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③；与《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相比，《红楼梦》的结构更加自然和从容，成就远在它们之上。

《红楼梦研究》还将《红楼梦》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等小说名著进行比较，认为《红楼梦》具有诗的风格，它“从头到尾，每句言辞所引起我们的，都是一种意象或情感，绝无意念；即令作者的思想表现，也使我们不觉其为意念，而是一种意象”^④。

综合《红楼梦》各方面的艺术特质，李辰冬下结论说，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中客观主义作家的伟大代表：

^{①②③④}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五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从全部文学史看，换句话说，从所有的文艺作品看，创作家的心理分野，可分两大类：一是主观的，一是客观的。一个以“我”为主体，以“我”为宇宙的象征，想把整个世界容纳于“我”的人格之中，照“我”的意象重造宇宙；这一派最大的代表是丹丁与哥德。一个是把自己的“我”倾注到宇宙，分散到宇宙，使宇宙里到处充满了“我”。他不愿照自己的意识来改造宇宙，然宇宙本身就是他的象征。这一派最大的代表是莎士比亚与曹雪芹。^①

李辰冬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他预料会引起许多人的惊异和怀疑。一则是中国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被征服的弱势，欧洲人瞧不起我们，而我们中的一些读了西洋作品的人却盲目崇拜西洋作品，对自己的祖宗反有藐视的趋势；二则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没有单独的对一部作品做全面系统的分析，也没有做过中外作品的比较研究。李辰冬自信他的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全面深入研究的结果，他坚信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人们会承认《红楼梦》是世界一流的作品。

李辰冬的另一部小说研究专著《三国水浒与西游》，是对胡适所谓的“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的研究。胡适把古代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分为两类，分别用不同的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的，但胡适的认识和方法中也存在一些偏颇和不足。可以说，《三国水浒与西游》正是针对胡适的偏颇和不足而发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按胡适的说法，它们是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的，胡适强调了演变的渐进性，忽视了演变过程中质的飞跃，忽视了最后一位写定者的文学创造的功绩，因而这类作品被误为集体创作，而文学最需要个性特质的创造性

^①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五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劳动,集体创作难以成就艺术一流的作品,胡适故而对这类小说的文学价值评价都不高。

《三国志演义》,胡适只承认它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却“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他的根据有三:第一,“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第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的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第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①。李辰冬认为胡适的三点根据和总的结论,都是偏见,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批评。其关键之点还是在作者罗贯中在成书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李辰冬的《三国演义研究》分为“三国故事的演变”、“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意识”、“三国演义的艺术造诣”三章。第一章他将三国故事的演变分为三大时期:一是历史故事的时期,二是民间传说的时期,三是历史与传说综合的时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演变的分析,结论是:如果没有陈寿著、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与民间流传之《三国志平话》,罗贯中很可能写不出《三国志演义》;然而,若没有罗贯中,“《三国志》也不过是干燥无味,零乱无章之琐碎故事,《三国志平话》也不过是怪诞不经,毫无历史价值,为文人学士所不取的话本而已”^②。在这个论断的基础上,李辰冬重点在论述罗贯中在《三国志演义》写作中的个人创造性。他首先强调《三国志演义》所表现的是罗贯中时代的社会意识,诚然,李辰冬对罗贯中时代的社会意识的见解大有商榷的余地,但他认为一部根据流传已久的历史题材写成的小说应该是它写作时的当代小说,因而它反映了作者那个时代的精神,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实际,也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其次,他在第三章“三国演义的艺术造诣”里一一反驳了胡适贬低《三国志演义》的三点意见。关于人物的创造,他分

^① 胡适《三国志演义序》(1922年)。

^② 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部一“三国演义研究”。